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启示

陈春泰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5年3月8日; 录用日期: 2025年3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5年4月14日

摘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性分析, 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强调资本积累与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的根本冲突。在重建人与自然关系方面,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了“控制自然”的观念, 认为这种观念源于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工具化利用。相反, 它倡导一种基于生态整体性和可持续性的和谐共生价值观, 强调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 并通过具体的实践路径加以落实。在社会变革和可持续发展方面,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系统的战略布局, 包括推动社会制度变革以构建生态社会主义、整合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实现协同共进等。这些战略涵盖了区域规划、产业政策调整和社会公平保障等多个维度。此外,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生态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矛盾, 凝聚了广泛的社会变革力量。同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启示跨学科研究与实践协同, 通过整合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 破解复杂的生态难题, 为应对生态危机、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面且深入的理论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人与自然, 启示

The Multiple Implications of Ecological Marxism

Chuntai Chen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r. 8th, 2025; accepted: Mar. 28th, 2025; published: Apr. 14th, 2025

Abstract

Ecological Marxism, through its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lays bare that the root cause of ecological crises lies in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t emphasizes the fundamental conflict betwee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文章引用: 陈春泰.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启示[J]. 哲学进展, 2025, 14(4): 265-271.
DOI: 10.12677/acpp.2025.144159

When it comes to re-establis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Ecological Marxism challenges the concept of “dominating nature”, which it deems stems from the instrumental use of nature under capitalism. Instead, it promotes a value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ased on ecological integrity and sustainability. This value highlights the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is implemented through specific practical approaches. Regard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logical Marxism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lan. This plan includes driving social system reforms to build eco-socialism and integrating ecological development with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to achieve collaborative advancement. These strategies cover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regional planning, industrial policy adjustment, and ensuring social equity. Moreover, Ecological Marxism offer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backing to the ecological movement. By uncovering the ecological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capitalist system, it rallies extensive social forces for change. At the same time, it encourage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practical cooperation. By combining knowledge from various disciplines like ecology,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it aims to solve complex ecological problems. In doing so, it provides a thorough and in-dep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e for addressing ecological crises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Ecological Marxism, Humanity and Nature, Implication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深度挖掘与系统反思

1.1. 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生态矛盾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的托·约·登宁的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有 300% 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1] 资本主义以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为基础，资本的逐利本性驱使企业不断追求扩张与利润最大化。在这种逻辑下，企业往往将生态成本视为外部性，即由社会和自然环境来承担，而非纳入自身的生产成本核算。这种负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使得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问题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有效解决。例如，某些跨国化工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选择在环保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建厂，或者采用落后但廉价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往往伴随着大量的污染物排放，如印度博帕尔灾难就是典型案例，造成了数千人死亡和长期的环境污染。这种行为不仅对当地的土壤、水源和空气造成严重污染，还可能对周边居民的健康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 ([2], p. 101) 这种对工人的剥削与对生态的破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相互交织，因为压低工人条件和忽视环境保护都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手段。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机制虽提升效率，却也加剧企业恶性竞争，导致整个行业削减环保投入，生态破坏愈演愈烈。

从全球看，资本主义国家凭借不平等贸易关系与经济剥削，将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印度等国家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同时，也承受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这种“污染转移”加剧了全球生态失衡，并进一步扩大了南北国家之间的生态不平等。这充分表明资本主义

制度的内在逻辑与生态可持续性之间存在根本矛盾。若不从根本上变革现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生态问题将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呼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将生态可持续性置于经济发展的核心，而非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

1.2. 生产与消费模式的生态异化

该思潮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异化劳动”和消费领域的“异化消费”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不再是实现人的本质的活动，而成为一种被迫的、仅仅为了获取生存工资的手段。工人无法控制劳动过程，也无法从劳动成果中获得满足感，劳动产品成为异己的力量。这种“异化劳动”导致生产的盲目性和无节制性，生产的目的不再是满足人类的真实需求，而是为了资本的增值。

例如，在快时尚产业中，企业为了追求快速的利润回报，不断推出新款服装，缩短生产周期。根据研究，全球每年生产的服装中，超过 30% 从未被售出，最终被填埋或焚烧，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同时，这种生产模式也伴随着对劳动力的过度剥削，包括长时间的工作、低工资待遇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等。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 [3] 这深刻反映了异化劳动的本质。

在消费端，“异化消费”现象泛滥成灾。现代商业文化通过广告、媒体等强大的宣传工具，不断制造和刺激人们的虚假消费需求。这些需求并非基于人的真实需要，而是被资本操纵的结果。消费者被诱导购买大量超出其实际需要的商品，消费行为逐渐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和满足虚荣心的手段。例如，在智能手机市场中，部分消费者受到广告宣传和社交攀比心理的影响，频繁更换新款手机。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20 年全球电子废弃物监测报告》，全球每年产生的电子垃圾超过 5000 万吨，其中智能手机是主要来源之一。这些电子垃圾中含有铅、汞、镉等有害物质，对土壤、水源和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这种畸形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不断加剧了生态环境的压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呼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逻辑，建立一种以生态可持续性为核心的经济模式，将人的真实需求与生态系统的健康置于首位。

2. 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重塑与实践路径探索

2.1. 摒弃“控制自然”的虚妄观念，回归和谐共生的本真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力地批判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在人类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控制自然”观念。这一观念的形成源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科技力量的过度自信，认为凭借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能够主宰自然、征服自然，将自然视为满足自身利益的无限资源库和可随意改造的对象。然而，这种观念严重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内在关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警告：“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4] 在历史上的许多大规模开发活动中，如欧洲中世纪的森林砍伐和美国西部的拓荒运动，人类为了获取更多的耕地、木材和矿产资源，对自然环境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式开发。例如，美国西部的拓荒运动导致了数百万公顷草原的消失，引发了严重的“黑风暴”事件，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灾难。这些行为虽然在短期内满足了人类的某些物质需求，但却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灾难，如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生物多样性锐减以及气候异常变化等。例如，欧洲中世纪的森林砍伐导致了大规模的水土流失，许多地区至今仍未恢复生态平衡。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表明，自然是一个复杂而有机的整体，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和平衡机制，如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生态平衡等。人类的每一个行为都会在自然系统中产生连锁反应，当这种反应超出自然的自我调节能力时，就会引发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因此，我们必须彻底摒弃这种“控制自然”的

错误观念，尊重和敬畏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2. 倡导和谐共生价值观，构建全方位的生态友好型社会

它积极引导我们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实践活动之中。在城市规划与建设方面，应摒弃传统的以经济发展为唯一导向的模式，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例如，在城市设计中，应增加城市绿地、公园、湿地保护区等生态空间的比例，打造生态廊道，促进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与周边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连通性。这些生态空间不仅能够美化城市环境、改善空气质量、调节气候，还能为野生动植物提供栖息地，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同时，城市的建筑设计应注重节能减排，采用绿色建筑材料和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在农业生产领域，应大力推广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和可持续农业模式，摒弃传统化学农业对化肥、农药和转基因技术的过度依赖。正如马克思所言：“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 p. 928)例如，生态农业注重利用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采用轮作、间作、套种等种植方式，以及生物防治病虫害的方法，减少化学农药和化肥的使用。这种农业模式不仅能够保护土壤肥力、减少水体污染、维护农村生态环境，还能生产出更加健康、安全的农产品，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食品的需求。

在日常生活中，从个人的衣食住行到家庭的能源消费习惯，都应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例如，倡导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和浪费；优先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降低私人汽车的使用频率；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鼓励家庭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利用，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率。通过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点滴行动，使每一个个体都成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3. 对社会变革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布局与创新思维

3.1. 推动社会制度变革，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蓝图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积累逻辑与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存在根本性矛盾，唯有通过制度性变革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生态危机的根本性解决。在生态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下，经济活动将突破资本增殖的单一价值导向，转向以人类真实需求满足与生态承载力维护为核心的双重目标范式。这种转型要求对现有社会制度进行系统性重构：经济制度重构需建立基于生态理性的新型资源配置体系。通过立法确立生态红线制度与碳预算机制，将资源优先配置到有利于生态保护和社会公平的领域。具体路径包括：① 实施能源结构革命性调整，通过碳税征收、化石能源补贴取消等政策工具，加速光伏、风电、氢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化进程；② 构建物质闭环流动体系，运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与生态设计标准，推动制造业向“原料-生产-回收-再生”的全周期循环模式转型；③ 建立区域生态补偿机制，通过跨行政区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交易制度，破解资源禀赋差异导致的环境不公问题。政治制度变革需要构建多元共治的生态治理体系。在国家治理层面，应强化生态环境法典的刚性约束，建立环境执法垂直管理体系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并运用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等技术手段构建天地一体化的环境监管网络。在社会治理维度，需通过立法保障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具体可建立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陪审团制度、开发公民科学环保监测平台、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认定规则，形成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渠道。全球治理层面，应推动重构国际环境法律体系，建立基于历史排放责任的碳债务清算机制，要求发达国家切实履行技术转让与气候资金承诺，同时构建南南气候合作

网络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低碳转型能力。

3.2. 整合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多维度协同共进的可持续愿景

该思潮着重强调了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整合与协同共进，倡导在制定政策和发展战略时摒弃传统的将三者相互分割的思维定式。在区域发展规划中，要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社会公平的保障，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在一些生态脆弱地区，如山区、沙漠边缘地区、湿地保护区等，不能盲目追求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而应因地制宜地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特色手工艺等绿色产业。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可以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景观和文化资源，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带动当地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居民收入。发展生态农业可以保护当地的土壤、水源和生物多样性，同时生产出绿色、有机的农产品，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特色手工艺产业则可以传承和弘扬当地的传统文化，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在这些生态脆弱地区，还应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通过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草、湿地恢复等措施，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服务功能。

在产业政策制定方面，要注重引导企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信贷、补贴等政策手段，鼓励企业加大对环保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投入，提高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管理水平。例如，对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节能减排效果显著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对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加大税收征管力度，限制其发展，并推动其进行技术改造或转型升级。同时，要加强对新兴绿色产业的培育和扶持，如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绿色建筑产业等，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在社会发展方面，要注重保障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生态与经济成果。例如，在推进生态保护和建设项目时，要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就业安置政策等方式，确保居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并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而逐步提高。此外，还要加强生态教育和宣传，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和环保素质，培养全社会的生态文明理念，形成人人关心生态、人人参与环保的良好社会风尚。

4.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行动指南与多元实践策略

4.1. 为生态运动注入理论活力，推动社会变革力量的凝聚与壮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的生态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思想指引，推动其从单纯的环境保护诉求向更具系统性的社会变革运动转型。该理论使环保主义者深刻认识到，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社会危机，与社会正义缺失、经济分配失衡、政治权力垄断等深层问题存在共生关系。典型表现为：在工业污染密集区域，环境污染风险呈现显著的阶层与族群分布特征，低收入群体、少数族裔等弱势社区往往成为环境公害的首要承受者。这些社区因政治话语权缺失、经济资本匮乏与社会支持网络断裂，难以形成有效的环境抗争力量，被迫承受健康受损与生存空间恶化的双重压迫。因此，现代生态运动已超越传统环保主义的技术改良路径，转向构建环境权益与社会公平的联结机制：既要通过环境监管制度约束企业行为，更需建立受损群体的权益保障体系。这种将生态治理嵌入社会正义框架的实践路径，显著拓展了环境运动的社会基础。20世纪80年代美国兴起的“环境正义运动”即是典型例证：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影响下，运动通过诉讼抗争、政策倡导和社区组织等方式，成功推动《环境正义行政命令》等政策出台，有效遏制了环境种族主义歧视，开创了环境权益与社会公平协同推进的新范式。

4.2. 启示跨学科研究与实践协同，破解生态难题的综合创新路径

其融合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独特特征，深刻地启示我们在研究和解决生态

问题时,必须摒弃单一学科的局限性,积极构建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和实践平台,开展多学科协同研究和综合施策。生态问题本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多维度性,涉及到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生物学、地理学、化学、物理学等多个学科对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等方面的研究,以及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等学科对人类社会行为、制度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利益分配等方面的探讨。例如,在研究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时,自然科学家通过气象观测、卫星遥感、气候模型等手段,深入分析气候变化的物理过程、趋势预测以及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如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增加、生物栖息地丧失等。而社会科学家则着重研究人类活动(如工业生产、能源消费、交通运输、农业活动等)对气候变化的驱动因素,以及不同国家、地区和社会群体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利益博弈、政策制定、技术创新、社会适应策略等。例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分担、资金技术支持等方面存在着复杂的利益矛盾和谈判博弈;不同行业(如能源行业、制造业、农业等)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态度和应对策略也各不相同;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变化也会影响到气候变化政策的实施效果等。

只有通过跨学科的协同研究和综合施策,才能全面深入地理解生态问题的本质和根源,并制定出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实践中,可以建立跨学科的研究机构或项目团队,汇聚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开展联合攻关。例如,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成立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整合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多学科的研究力量,针对区域生态环境问题开展综合研究和实践探索。同时,要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知识共享和成果转化。例如,举办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会、专题培训班等,为不同学科的人员提供交流互动的平台;建立跨学科的研究数据库和信息共享平台,方便研究人员获取相关资料和数据;鼓励跨学科的研究生培养和人才交流,培养具有多学科背景和综合创新能力的专业人才等。通过跨学科研究与实践协同,我们能够打破学科壁垒,整合各方资源,为破解生态难题提供综合创新的路径和方法,实现从理论认识到实践行动的有效转化,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有利的保障。

5. 结语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凭借深邃的洞察力与系统的理论阐释,为我们拨开生态危机的重重迷雾,指明了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推动社会变革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它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生态矛盾的剖析,让我们清晰认识到生态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制度根源;对生产与消费模式生态异化的批判,促使我们反思现代经济运行逻辑的弊端;在重建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理念倡导,引导我们回归尊重自然、和谐共生的正途;在社会变革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布局上的思考,为构建生态社会主义蓝图提供了框架思路;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策略上的启示,更为生态运动注入活力,开启跨学科破解生态难题的新路径。当今时代,生态危机警钟长鸣,全球生态治理任重道远。我们需深刻汲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养分,将其理念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与层面。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政治治理体系的完善,还是社会文化观念的重塑、国际合作交流的拓展,都应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与经济社会协同共进的原则。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凝聚起推动生态变革的强大力量,积极探索符合时代需求与生态规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如此方能在生态保护与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征程中,书写绚丽篇章,实现人类与自然的永续发展,让地球家园重焕生机与活力,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世界。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1.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01.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56.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59-560.